

# 學術論辯、科際對話與臺灣歷史社會研究

## ——讀柯志明

### 《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

張隆志\*

#### 一、前言

臺灣本土研究自一九八〇年代後蔚為顯學，然而在坊間汗牛充棟的中文臺灣史作品中，雖然可見充滿政治性的論爭，但卻少見不同領域學者間的研究對話，更缺乏具有典範意義的學術論辯。對於關心臺灣史學研究水平及學術發展的讀者而言，柯志明《番頭家》一書的問世，<sup>(1)</sup>無疑是件值得欣慰與期待的盛事。筆者的主要理由，除了由於本書是部嚴謹細緻的中文歷史社會學論著外，更因為它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臺灣史學術論辯作品。

本書作者曾在其日治時期臺灣殖民經濟史的專著中，將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的糖業帝國主義論與川野重任的米穀經濟論，在米糖相剋問題及臺灣資本主義化的重要課題上相互檢證及對話，並進而提出對於家庭小農經濟及邊陲資本主義發展的獨特見解。<sup>(2)</sup>在《番頭家》一書中，他則以清代國家與臺灣土著地權作為核心課題，對於美國人類學者邵式柏（John R. Shepherd）及臺灣地理學者施添福的重要理論與實證研究成果，進行細密而嚴謹的論證，更進而在新史料及方法論的基礎上，建立其關於十八世紀臺灣番政改革與清代番租類型形成演變的替代性

---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助理（新制）。

(1)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

(2) Ka Chih-ming,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Taiwa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理論與歷史解釋。此一具有強烈科際對話與學術論辯企圖的研究風格，實為本書不同於一般歷史學個案作品的首要特色。以下試就個人知見所及，對本書論旨及內容特色做一引介，並就相關課題進行初步反思，期能引起方家學者對此書論旨的重視及回應，對臺灣史研究討論風氣的提升，收拋磚引玉之效。

## 二、本書內容提要

《番頭家》一書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列入該所專書第3號，共計440頁。本書的研究題旨，如作者所言，在於「闡明族群政治如何導致熟番地權的變化以及影響熟番地域的分布與調整，從而開拓瞭解清代臺灣統治與族群關係的新視野。」全書正文共13章，除序文、導論及結論外，共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份為歷史敘事（2-9章），是「利用大量尚未開發的一手資料，就土地制度以及人文地理分布，具體呈現清代臺灣族群政治的內涵與運作。」第二部份則為理論分析（10-12章），是「就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經濟活動的核心場域：平埔族與漢人間的土地權利關係（熟番地權），詳盡考證清代與日治時期的官方、民間史料，深入反省、校正了過去日美學者權威性見解的偏差與盲點，並據以精確分辨各種熟番地權類型，追溯其演變過程。」除主要原始文獻外，全書更附錄有由地理資訊系統（GIS）製作的現代版乾隆二十五年《臺灣番界圖》與多幅精密歷史地圖，及長達三十頁的專有名詞索引，以便於讀者查考。茲簡述全書章節篇目如下：

序言

第1章 導論

第2章 族群政治

第3章 清初封禁下的番漢土地安排

第4章 熟番地的開墾與官方的介入

第5章 地稅改革與番地開禁

第6章 熟番暴動與番地的再封禁

第7章 族群結盟策略與三層制族群分布制度

第8章 熟番地保護的落實

第9章 三層制族群分布制度的危機與重構

## 第 10 章 熟番地權的分類與演變

## 第 11 章 番租的保護與分布

## 第 12 章 「熟番地權演化」

## 第 13 章 結論：歷史制度論的分析

作者在導論中首先介紹其主要對話對象及作品，也就是邵式柏與其 1993 年出版的英文專著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sup>(3)</sup> 尤其是書中關於以成本效益觀點 (cost/benefit calculus) 分析清代邊疆經營及其對於「熟番地權演化」(the evolution of aborigine land rights) 的論點。他接著介紹施添福對於清代番界與人文地理區的實證及田野研究成果，以及其對於清代平埔族群遷移及土地流失的觀察。<sup>(4)</sup> 並進而以「理性國家說」與「國家剝削論」對照兩者的觀點歧異，作為清代國家角色與臺灣土著地權問題上的兩個主要典範性學說。而全書的論證，即環繞著國家與土著地權的問題主軸展開，以番政變革，番租類型與番地分布作為三項主要討論課題，並據以提出「族群政治 (ethnic politics)」的解釋範型。

在第一部份的歷史敘事，作者提出其對於十八世紀番政變革的歷史時序與因果分析，他以雍正五至九年的地稅改革，尤其是乾隆十年福建布政使高山奏准施行，也就是「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頁 55) 的三層制族群分布政策作為歷史分水嶺，說明清廷如何從原先模糊的封禁與族群隔離政策，轉變到倚生番為「外衛」並積極利用熟番的政策。除了仔細釐清清初各種地權形式及番地流失管道之外，作者更提出「重新配置 (reallocation)」的論點，說明乾隆中

(3) John R. Shepherd, "Plains Aborigines and Chinese Settlers on the Taiwan Frontier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1);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關於本書的評介，可參見張隆志，〈歷史人類學與西文臺灣史研究的里程碑：評介邵著《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臺灣史研究》1: 2 (1994)，頁 150-155。

(4) 施添福的相關代表作品有：〈臺灣歷史地理研究割記(-)：試釋土牛紅線〉，《臺灣風物》39: 2 (1989)，頁 95-98；〈清代臺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9 (1990)，頁 67-92；〈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臺灣風物》40: 4 (1990)，頁 1-68；〈區域地理的歷史研究途徑：以清代岸裡地域為例〉，收於黃應貴編，《空間、力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頁 39-73。以及〈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的土地拓墾和族群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研討會」會議論文，1998。

葉族群政策轉向的結構因素與制度安排，詳盡解說伴隨著三層制與隘番制的一連串政治經濟配套措施。並以林爽文事件及屯番制的設立為例，評估此一番政變革的實際功效與副作用，以及事件後清廷對抑制漢人界外私墾政策的調整。

在第二部份的理論對話，作者根據大量的清代契字文書與官書資料，提出其對於番租類型之新見解，指出番租就其歷史演變過程，可以分成純社餉、貼納番租、番大租、免正供的番大租，及社番口糧租等五類（頁 281-282），並進而重新檢視邵式柏「熟番地權演化」理論以及日治初期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的番租理論，批駁其有關「漸進順應」說法，及其所隱含的「演化史觀」。另一方面，他則以土地申告書、淡新檔案，以及岸裡社與竹塹社等平埔文書案例為基礎，指出番租所佔比例因其所處地帶而有所不同，及其主要座落在熟番保留區和土牛界沿邊的事實，修正邵式柏有關熟番地分布與保護實效的「族群安定現狀（ethnic status quo）」的說法，並以「重新配置」作為其替代性理論。

最後在結論中，作者總結他對於清代國家與熟番地權的實證研究成果，並闡明其從事臺灣歷史社會分析的方法論立場。他以演化生物學與古生物學者 Stevan Jay Gould 對於演化及歷史機遇（contingency）的論點，批評普同法則式的理性國家論及漸進連續的演化史觀，並以歷史社會學家 Charles Tilly 為例，指出因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在社會過程的重要性。作者在強調國家作為制度內主要歷史行動者之一，以及歷史過程中危機與意外結果的可能性的歷史制度論立場上，認為「熟番地權制度的形成與轉變，除了反映出清廷臺灣統治的特定關切外，同時也是清廷與番漢族群互動的結果，也就是族群政治的結果。」（頁 377）而清代臺灣社會的形構，並非基於預設的道德原則，或是內在的完美方向性或高明的控制，而是「卑微的基於行動者間彼此互動的制度性結果。」（頁 378）

### 三、問題與討論

作為一部帶有鮮明論辯色彩，兼顧歷史實證與理論企圖的社會學著作，筆者認為《番頭家》一書在清代臺灣社會史研究上的具體特色，可綜述為以下各項：

（一）研究課題的重要性：作者以清代臺灣土著地權的形成與變遷為核心，進行實證個案研究與理論探討。本書的論證及解釋，提供了對於清代中國邊疆經營與

移民開發史，尤其是國家角色與土地租佃制度等重要課題的新視野。<sup>(5)</sup>

(二)新史料的開發利用：本書除徵引故宮檔案及《淡新檔案》等重要清代中央及地方官方史料外，更充分利用《岸裡文書》及《竹塹社文書》等清代臺灣平埔古文書，尤其是日治初期新竹地區《土地申告書》等重要史料，進行實證研究與量化分析。

(三)史實的重建與解釋：作者以乾隆中葉臺灣三層制族群分布政策的形成與變遷為主軸，提出其對於十八世紀臺灣番政變革的系統性見解；並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呈現清代番界分布及族群遷徙路線；更運用分類學的概念，提出其對於番租類型與演變的新見解。

(四)歷史理論化的具體範例：本書以理性國家說與國家剝削論為討論對象，進而提出族群政治論的解釋架構，闡明國家如何操控族群關係，導致熟番地權的變化及影響熟番地域的分布，作為瞭解清代臺灣統治的替代性理論。

(五)歷史社會學的書寫設計：作者將全書論證，分成歷史敘事與理論對話兩部份，嘗試兼顧理論建構與史料實證，以及史實重建與因果解釋間的不同需求。並結合豐富圖表及索引，以便研究者徵引閱讀。

(六)社會學方法論與歷史觀念的闡釋：本書提出歷史制度論作為其分析清代國家邊疆統治與土著地權變遷的方法論立場，並強調歷史機遇演變及有限理性的觀點，批判理性國家說及其理性選擇說與演化史觀的知識論假設。

另一方面，在肯定《番頭家》一書在學術論辯、史料實證與理論建構等方面的旺盛企圖與嚴謹努力的同時，筆者以下嘗試在臺灣平埔研究及明清中國史的新近成果基礎上，從多族群社會觀的視角，對本書的兩大核心論點（三層制族群分布政策及番租類型與演變）與作者所提出的替代性理論（族群政治論）中，所涉及的相關史實與方法論課題，進行初步討論，期能作為學者進一步對話的參考。

## (一)關於十八世紀臺灣番政變革論與族群政治論

如前所述，作者在本書第一部份以清代前期清廷（皇帝及官員）關於臺灣統

(5) 關於此一課題的相關研究，參見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17-38。

治的諭示奏摺為主軸，輔以代表性民間契約與平埔番社文書的個案，重建以乾隆中期三層制族群分布政策為核心的政策過程（policy process）。他接受邵式柏所提出的國家——漢人——平埔族（熟番）的三行動者互動架構（頁 2），並補充發揮了施添福對於土牛番界及人文地理區的原創性研究成果，進而提出以國家操弄與族群聯盟為特色的族群政治論（頁 354），作為理性國家論與國家剝削說的替代性解釋範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雖然對於清代臺灣邊疆社會的歷史複雜性有深刻體認，但其對於十八世紀臺灣番政變革的史實敘述中，基本上是以批判理性說與剝削說的國家論為主軸，並凸顯清廷（尤其是高山、喀爾吉善、楊廷璋等閩浙高級官員）意圖透過「再配置」的積極手段推動族群分布的政策連續性（頁 197），作為「族群政治論」的具體實例。相形之下，做為本書對話對象之一的施添福，在其對於臺灣北部（竹塹地區）、中部（岸裡地域）及南部（鳳山八社）等個案研究中，雖然亦具體論析清代官方政策及番界變動的歷史脈絡，但卻更重視地方官員在執行上的可能權宜與實際落差，以及其在不同時期及區域族群分布成因及發展的差異。

以三層制族群分布政策為例，施添福在其相關作品中所呈現的清代歷史圖像，並非官方治臺及理番政策的積極意圖，而是臺灣移墾社會史在地域及族群的多重性格：如北部竹塹地區的墾隘多建立於乾隆四十年代以後，且基本上均由漢人擔任墾務。而中部平埔岸裡社群則雖由熟番守隘，但並非學家遷移，番社與軍工匠等特殊漢人團體間，更頻因界外私墾問題而發生糾紛衝突。至於作為國家剝削說及三層制首要例證的屏東平原鳳山八社，則自清初即因其稻作技能，成為官方重賦對象而流離遷移，而其雖在乾隆二十年代便陸續奉派守隘，但成效不彰，直至乾隆四十年代政府才廣建隘寮、攜眷同住，並配給隘埔耕食。<sup>(6)</sup> 上述有關清代台灣移墾社會在族群及地域上的複雜差異，以及對於官方政策歷史過程與實際內涵的不同見解，應是學者在討論三層制模式的歷史解釋有效度時的重要課題之一。

---

(6) 施添福，〈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的土地拓墾和族群關係〉，頁 56-60。

## (二)關於番租類型與演化史觀

無論在原始史料的開發爬梳及理論的概念建構，作者在第二部份所提出的番租類型論，實為本書最具原創性及論辯意義的論點（頁 296）。作者不但在實證層次，細緻嚴密的區辨出番租的五種類型，並仔細交代各類型的歷史成因與演變歷程，藉以說明現行臺灣土地租佃制度研究的主要典範：日治初期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中，視番租為變例（anomaly）的分類盲點。更進而從方法論的層次，指出其所隱含的十九世紀目的論式單線演化史觀，藉以批駁邵式柏書中第九章有關「熟番地權演化」的論證。他以「演變（transformation）」一詞，取代邵式柏「演化（evolution）」的說法，強調番租類型演變過程，並非內在邏輯的連續進展，而是不斷因外力而發生劇烈突變的產物（頁 28）。另一方面，他透過番地分布及番租比例的量化分析，指出邵式柏書中有關臺灣北部熟番地保護成效的個案，實為三層制族群分布政策下「重新配置」的結果。

關於清代華南及臺灣社會的多重地權研究，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明清社會經濟史的重要課題，並因學派立場的不同，而出現對租佃制度歷史功能及意義的差異評價。<sup>(7)</sup> 而臺灣豐富的官方及民間契約文書，更被國內外學者視為漢人開發史及土地制度研究中的珍貴史料。近年來由於平埔研究的興起，以及重要平埔文書及田野調查的發掘，逐漸為臺灣漢人開發史研究傳統中的理番政策及漢番關係，提供了新的研究動力與分析視野。作為此一新興領域中的重要成果，筆者認為本書的番租類型論及番地流失論，雖然僅以邵式柏及施添福等人的代表性論著為主要對話對象，但其中有關番地流失問題，以及番地保護成效的量化分析，除了史料運用的問題外，實亦牽涉到不同研究者對「何謂流失」，如「贖買典讓」（頁 21）乃至「杜賣」（頁 334）等租佃行為的認定標準。

除了量化實證分析的有效性外，筆者關心的是，本書對於臺灣番租類型、歷史時序與轉變機制的論證，乃至邵式柏及《臺灣私法》作者分類盲點的批判，除了指出早已過時的十九世紀演化史觀及其知識論缺陷外，究竟將如何影響學者對

(7) John R. Shepherd, "Rethinking Tenancy: Explain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 3 (1988), pp. 403-431.

於現行的明清中國租佃制度的研究與解釋。換言之，《番頭家》一書所提出的臺灣番租類型論，除了凸顯清代臺灣熟番地權制度歷史背景與過程的特殊性外，究竟是否（如何）能具體在概念及操作上，超越《臺灣私法》的分類體系及解釋架構，而成爲作者所說的替代性典範（頁 32）？

### (三)關於滿清帝國統治意識型態與中國文化主義

作者在本書第二章從比較歷史及政治經濟學的分析立場，提出對於清帝國邊疆統治意識形態的看法，他引用 I. Wallerstein 等人對西方民族國家起源，以及人類學者 B. Anderson 等人對現代民族主義的研究，以對照美國學者 J. Levenson 等人所強調的中國儒家文化主義。（頁 36）並以同心圓式的中國天下秩序觀，說明康熙晚期至雍正初期，清廷對於臺灣生番歸化政策的推動，以及其在理想現實落差下，轉向族群隔離與結盟政策的歷史過程。（頁 52）

近年來美國中國研究學者對於以文化主義與儒家同心圓式理想來描繪傳統中國世界觀的成說，如費正清等人的代表性作品，<sup>(8)</sup> 陸續提出不同的修正見解。如 J. Millward 以清代前期新疆統治及中亞民族歷史的研究爲例，具體指出傳統同心圓解釋模式的限制，<sup>(9)</sup> S. Harrell 等人從比較觀點，具體討論儒家意識型態在不同邊疆的文化接觸經驗，<sup>(10)</sup> P. Crossley 則從滿族史的角度，批判檢討以中國文化主義描述清帝國統治意識型態的偏失，<sup>(11)</sup> 而 J. Hevia 更以從後現代史學的視角，重新改寫乾隆朝與英帝國關於朝貢制度的儀式爭辯。<sup>(12)</sup> 上述研究成果雖各有其論旨，但均強調清帝國作爲一征服王朝及多族群帝國的歷史特性，亦對中國文化主義及儒家同心圓秩序說，及其背後隱含的「傳統中國 vs. 現代西方」的現代

---

(8)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9) James Millwar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Qing Frontier," in Gail Hershatter et al., eds., *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43-155; James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9.

(10)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pp. 3-36.

(11) Pamela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2) James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9-56.



性論述提出質疑。另一方面，以濱下武志為主的日本學者，更從亞洲史及地域史的研究視野，提出對於朝貢體系、天下秩序與國際關係的不同歷史解釋及分析架構。<sup>(13)</sup>此外如人類學者 M. Sahlins 則從象徵秩序與宇宙觀的視角，對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不同文化體系的比較研究，提供了結合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的具體例證。<sup>(14)</sup>雖然本書有關中國文化主義及儒家天下秩序的說法，並非作者的主要論點，但上述重要研究成果，應有助於吾人理解滿清帝國意識型態的特殊性及邊疆統治的複雜性，並進而重新思考傳統典範的限制及新的解釋可能。

#### (四)關於熟番「族群」及「國家——漢人——熟番」三行動者分析架構

本書有關番政變革及族群政治的史實論證，具體批駁邵式柏對於清代邊疆政策理性及調適能力的過度溢美，而本書對於「熟番族群」的界說（頁 365-366），則釐清了「熟番」一詞，在本書分析中作為一政治性社會類屬，而非文化性或主觀認同意義的「族群」，以及其作為一集體性行動者（aggregate actor），在制度結構內與不同歷史行動者（國家、漢人、生番）的策略選擇進行互動的理論意涵（頁 378）。但作者在其族群結盟與族群政治論的歷史敘事中，基本上仍遵循著邵式柏的「國家、漢人及熟番」的三元分析架構，而較未討論族群身份及邊界的可能流動性，乃至「生、熟番」分類範疇本身的歷史性（historicity），以及在「熟番」政治類屬內部的族群社會差異。

舉例言之，作者在第六章論證中將雍正九至十年大甲西社事件視為「熟番集體暴動」，歸因於雍正朝地稅改革等措施所造成番地大量流失的意外結果，並舉官方動員漢人平亂及酬庸土地等事例，認為此事件是漢番結構性勢力消長的歷史分水嶺（頁 362）。然細究相關複雜史實，我們發現「國家、漢人及熟番」的三元互動架構，並無法具體分析此一清代最大的平埔抗官事件：不但「國家」內部官員在主戰主和間彼此攻訐（頁 134），而「漢人」義民中雖多為佃戶，但亦有如張達京等著名熟番社通事，更重要的是在「熟番」類屬中除了起事的牛罵、沙轆等「叛

(13) 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頁 3-32。

(14) Marshall Sahlins, "Cosmologies of Capitalism: The Trans-Pacific Sector of 'the World System'," in Nicholas Dirks et al., eds., *Culture/Power/History: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12-455.

番」外，更有作為平亂主要武力的岸裡社等「義番」（頁 137），而巴宰族群中除岸裡社外的樸仔籬、阿里史等社群，則在初期亦加入反叛行列。從族群聯盟的角度而言，此一事件實不只反映了臺灣中部拓墾過程中番漢勢力的消長（頁 140），更代表了中部「熟番」平埔族群間的內部勢力消長與重組。<sup>(15)</sup> 而清代臺灣多族群社會的複雜性，更具體呈現在如本書對乾隆十六年內凹莊事件的描述中，「國家」面對「生番」、「熟番」，乃至漢人「通事」、「番割」等媒介人物的多重糾結（頁 167）。

雖然作者在導論中對於國家中心論 (state-centered approach) 加以批判（頁 29），但其族群政治論中對於國家角色及政策過程的分析，基本上仍是以清廷番地政策過程為主軸的歷史敘事，而非由皇帝、中央、省、地方、差役胥吏等階層所構成的複雜清代官僚體系的內部運作及可能張力。<sup>(16)</sup> 讀者所看到的歷史圖像，是熟番與漢人在此制度結構過程中的相對位置及角色變遷，而非個別族群與個人作為歷史行動者的積極意圖與具體作為。另一方面，本書以熟番地權為焦點的分析，使得其在平埔漢化的問題上，亦從熟番的制度性角色及其物質基礎加以立論（頁 370），與台灣平埔研究者對族群意識及認同記憶等課題的文化詮釋觀點，乃至近年來後殖民史學所強調的底層民眾社會史的分析取向，形成明顯對照。<sup>(17)</sup>

## 四、結語

如本文前言中所述，筆者認為《番頭家》一書的首要特色，在於全書所呈現的科際對話與學術論辯的強烈企圖。作者在序言中誠實而嚴肅的回顧其在跨越歷

(15) 翁佳音，〈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史：Quata 大肚番王初考〉，《臺灣風物》42: 4 (1992)，頁 145-188；張士陽，〈雍正九、十年台灣中部の先住民の反亂について〉，《台灣近現代史研究》6 (1988)，頁 5-55。

(16) 關於清代帝王與官僚間的張力，及中央與地方間互動的歷史分析，參 Philip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Beatrice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7) 關於如何重構底層民眾歷史的方法論及知識論探討，可參見印度 Subaltern Studies 對於殖民史的研究，Ranjit Guha, "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 in 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5-88; Gayatri C.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G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271-313.

史學與社會學兩大領域，投入清代臺灣史的研究過程中的多重「文化衝擊」，以及其如何面對在理論建構與史料實證，史實重建與因果解釋間內在張力的心路歷程。並對於臺灣社會學者與歷史學者間的建設性對話，抱持樂觀的期待（頁 X）。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角度而言，本書所涉及的豐富理論課題，如制度論與歷史研究，<sup>(18)</sup> 社會學分析與理性選擇理論等，<sup>(19)</sup> 實提供了人文社會科學的歷史轉向過程中，不同領域學者進一步對話的可能基礎。<sup>(20)</sup> 而本書以細密的實證研究為基礎，在政治經濟學分析及其歷史制度論立場上，提出其對於國家、族群、土地等研究課題及概念的嚴謹論證，亦可與近年來學者對於文化轉向的檢討，<sup>(21)</sup> 乃至國家與文化關係的討論作一對照與交鋒。<sup>(22)</sup>

嚴格而言，本書作者與人類學者邵式柏間的批判論辯，集中在邵著第 9 章對於番大租制度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而非邵式柏對於臺灣平埔社會文化的歷史分析與民族誌描述。<sup>(23)</sup> 書中對於地理學者施添福作品的徵引討論，亦以國家剝削說及熟番地權問題為主，而非施添福對於臺灣區域地理及地域社會研究典範如富田芳郎等人業績的批判繼承。<sup>(24)</sup> 由於作者並非就邵施兩人的個別研究旨趣及不同學科脈絡加以比較評論，而是從國家論及地權問題的研究視角來解讀兩人相關作品，遂有邵、施兩人「各自偏執於其特定國家取向」等主觀論斷（頁 25）。但《番頭家》一書在番界問題上對於施添福人文地理研究的補充、修訂及發揮，以及在番大租問題上對於邵式柏政治經濟分析的質疑、反駁及取代，尤其是作者重視實

(18) "Polity Forum: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ism," *Polity (Journal of the Northea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8: 1 (1995), pp. 83-140.

(19) "Symposium on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3 (1998), pp. 722-871; "Analytic Narrative by Robert Bates, Grief, Levi, Rosenthal, and Weingast: A Review and Respon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3 (2000), pp. 685-702.

(20) Terrence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245-280.

(21) Victoria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2) George Steinmetz, ed., *State/Culture: State Formation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23) 參見邵式柏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書中第 2、3 章，尤其是第 11 章關於平埔歷史與文化變遷的討論。

(24) 施添福，〈臺灣竹塹地區的聚落發展和形態〉，收於陳秋坤、許雪姬編，《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92），頁 57-104。

證研究與追尋替代性理論的研究企圖與執著精神，相較於八〇年代臺灣史學界對臺灣近代化<sup>(25)</sup>及土著化與內地化理論的討論內涵與水平，<sup>(26)</sup>實可作為臺灣史學術論辯的一個具體範例。雖然作者在其序言中對於臺灣史學界在史料與理論上的學科地域主義（parochialism）的描繪，乃至諸如「歷史學的租界」、「雞同鴨講」與「聾子的對話」等比喻戲稱未必完全公允。但對比於人類學者及社會學者，對於科際對話及研究典範的深入反思與評論，<sup>(27)</sup>臺灣史學界缺乏嚴肅論辯風氣及研究討論專業倫理的現象，<sup>(28)</sup>實為關心臺灣史學發展的讀者深思力踐的課題。在此意義上，筆者除了呼應施添福教授對《番頭家》一書「值得人文社會學者仔細品讀」的推介外，更期待對臺灣史研究者而言，本書的出版意味著：「對話正式開始（The floor is now open）！」

---

(25) 施敏輝編，《臺灣意識論戰選集》（臺北：前衛，1988）；楊碧川，《後藤新平傳：台灣現代化奠基者》（臺北：一橋，1996），頁180-208。

(26)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1987）；陳其南，〈有關《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的幾點聲明〉，《當代》28（1988），頁72-75。

(27) 黃應貴，〈歷史學和人類學的會合：一個人類學者的觀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邁向新學術之路：學術史與方法論的省思研討會」會議論文，1998。〈對於「人文學及社會科學方法的哲學反思」之我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5:1（1995），頁33-36。謝國雄，〈陳紹馨、臺灣漢人民族誌與臺灣社會性質之探討〉，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一九九七社會學研討會」會議論文。

(28) 盧建榮，〈後現代歷史學指南〉，收於Keith Jenkins著、賈士衡譯，《歷史的再思考》（臺北：麥田，1996），頁21-35。